

重评科举制度

——废科举百年反思*

刘海峰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科举制并非像现代人们的印象那么黑暗,以往人们的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多是囿于清末人士对它的否定评价。其实古代不少文化名人也曾称赞过科举,从隋唐至明清,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对科举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并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科举制度;考试;八股文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5)02-0005-08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科举制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2005年不但是科举制废止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的纪念年份。自清朝末年,特别是自1905年以来,科举制长期被人们误解。实际上,历史上的科举制并不像现代人印象中的那么黑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在废科举100年后的今天,是到了重新评价科举制的时候了。本文将在介述古人对科举正面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今人为科举辩护的论点及其原因,力图给科举制一个更为公正的评价。

一、古人的评价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际遇和生活态度了。由于影响重大且与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赞美者与批评者都

* 收稿日期:2005-02-16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考试“十五”科研课题(教试中心44号)

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很多,而且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评价要多于负面的批评。但在现代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制是一个很坏的制度,现代人往往以为古代多数有识之士和进步人物对科举都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和偏见。

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囿于清末人士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科举时代对科举的批评与当今人们对高考的批评颇为类似。如果只看清末废科举时经过筛选的过激言论和后来的历史教科书,那么科举制的确很坏。如果后人对高考的印象都定格在1966年废高考前后的阶段,那就会形成这样的看法:“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1](P617)若只看经人们选择后的当代关于高考争论的部分观点或主张废高考派的言论,后人可能会认为所有当代中国人都十分痛恨高考制度,然而,实际上当今多数中国人还是赞成高考制度的。同样,清末对科举制的批判也往往是以偏概全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科举的评价总该更为冷静客观。

经过现代一些人的价值观的过滤,在各种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多见批判科举的言论,而肯定的言论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学课本中的《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只代表批判科举一方面的观点。古人对科举的评价,往往也与自身的体验和经历有关,金榜题名者与名落孙山者对科举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对科举持激烈批判态度者往往是屡试不第者,而中举及第者对科举较可能有肯定的评价。《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孔乙己》的作者鲁迅,都对科举有厌恶的情结。吴敬梓获得秀才后参加了多次乡试未中,对科举制甚感愤懑。因此有的论者认为,科举制并非一无是处,若科举制度并不是真的困死了人才,《儒林外史》就不过是小文人的一腔牢骚宣泄的产物,不值得学问家过分的推崇。^[2](P65)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企图通过行贿预先获得乡试考题,被查获后遭处罚并导致其家道中落。鲁迅对科举深恶痛绝可能与其家世有部分相关。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曾指出:科举是一种智力测验,科举人物可以代表智慧才能。聪明人也有落第的,怀才不遇和滥竽充数情形或者不免,但为数必极少。他从北京国子监明清进士题名碑抄录了27000余位进士的资料进行人才地理分布的实证研究,认为主张科举无法选拔才智之士的人,至少须找出百分之一,即270余人聪明而落第或及第而蠢者,才值得一个小小的注意。“‘科举在命不在文’,这是失意人常有的牢骚,我们何必受他们的欺骗。”^[3](P38)

但是,对待古代文艺作品,许多人以现代的观点来取舍,例如,批判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中的内容被选入语文教材,而大量称赞科举为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戏剧作品或传奇小说,被看成题材落后而被忽略。即使在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中,谈到状元戏或才子佳人小说时,也是先入为主地对科举持批判的态度。其实,除了清末时期,多数时候,许多有过中举和及第经历的人与屡试不第者对科举的态度往往不同,他们一般对科举不那么痛恨,不少人有肯定科举之词,古代不少文化巨人也曾称赞过科举。科举时代,不仅许多通过科举阶梯获得成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一般的知识分子多是拥护科举制度的。至于普通老百姓,往往以为科举是一种可以让人经过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不过,他们的许多赞美科举的言论既无法成文,也难以刊刻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少以往人们想不到的肯定科举的言论。这里我们略举一些史实,便可看出科举时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

唐代的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对考试取士和进士科都有过肯定的言论。宋代的苏轼曾极力为科举取士作辩护,欧阳修则高度称赞过科举制度。^[4](P109)科举制度受到赞扬最主要是因为其公平性。五代时王定保认为,科举考试以才取人,“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诎系于王公子孙。”^[5](P43)也就是说,不管家世出身高低,以才学为标准公平竞争。对于科举制是否能够选拔人才的问题,宋代陆九渊曾辩护说:“人才之不足,或者归咎于科举,以为教之以课试之文章,非独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从而困苦毁坏之。科举固非古,然观其课试之文章,则圣人经,前代之史,道德

仁义之宗,治乱兴亡得丧之故,皆粹然于其中,则其与古之所谓‘学古入官’,‘学而优则仕’者何异?困苦毁坏之说,其信然乎不也。”^[6](P297 - 298)陆九渊认为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理想本质上相同,认为科举制度能够选拔人才。

“至公”是长期贯穿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理念和原则。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客观,即“犹准绳也”。^[7](P749)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真正做到“至公”,至少科举制的许多制度设计是试图体现“至公”精神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8](P1232)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考试,只在至公”。^[9](P617)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体现得更为充分,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北宋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在《赐宋准等及第诏》中说:“国家悬科取士,校艺取人,……俾咸登于上第,谅克叶于至公。”^[10](P4356)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在讨论糊名法时宣称:“取士之意,务在至公,擢寒峻有艺者。”^[11](P1512)

当然,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有可能偏离考试取才的根本意图,因此也有人认为采用各种严防考试作弊的办法不一定就是符合公平的真正意义。熙宁二年(1069),苏颂曾上书说:“弥封、誊录本欲示至公于天下,然徒置疑于士大夫,未必尽至公之道。”^[12](P6 - 8)从中也可以看出科举制的核心理念是至公。按惯例,殿试前十名的试卷要奏请皇帝定夺,而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认为“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13](P3626)绍兴二十六年(1156),南宋政府决定,甚至对皇族也要执行禁止使用挟带的命令,以“示天下至公”。^[14](P4306)元代至元五年(1268)陈祐在上奏的《三本书》中也提到“或以科第为至公”。^[15](P205)

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主体建筑,它将“至公”这一科举制的核心理念用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是考试公平性的具体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16](P149)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考试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多数学者也未否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如魏源认为科举制不以贵贱取人,比世袭制和九品中正制进步。他说:“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虽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艺,岂能世世皆贤于草野之人?……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17](P60 - 61)

由于科举选拔出大量的人才,人们对具有真才实学的科举出身者十分敬重,因此科举时代流行着“科名以人重,人亦以科名重”的说法。这是在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所以显得重要、人们因而高度敬重科举,科举与人两者之间长期良性互动之后形成的格言。即使到了清末,对科举制批判的言论空前激烈,但人们批判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八股文而不是科举制本身。在19世纪末以前,很少有人直接提出要废止科举制,多数人只是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到20世纪初,因为内忧外患加剧,废科举才突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比原先研讨的计划一再提前,最后在没有充分展开讨论的情况下匆忙废止。

总之,我们对古人的科举观应一分为二,既看到批评科举的一面,也看到肯定科举的一面。科举并非完善的选才制度,但却是古代社会相对最公平的制度。经过千百年中多次改革对比实验,证明无法找到比科举制更合理而可行的选才办法,因此可以说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相对最优越的选拔人才方式。

二、今人的辩护

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典型者如吴晗曾说:“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18](P94)过去,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科举是一种只会造就腐儒的没落的取士制度,甚至认为“祸国殃民的科举制”严重地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思想和创新精神,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罪魁祸首,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19](P21-23)1998年,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黑二十四史》,其中第5卷包括缠足史、游戏史、宦官史、科举史、酷刑史、盗墓史。将科举与缠足、宦官、酷刑、盗墓摆在一块,可见在编者的心目中科举制度有多么黑暗。

然而,一般人较少了解,在科举制度废止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人物到胡适、钱穆等一流学者,都曾对科举制说出过赞誉之词。[20]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科举制平反,在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热潮,成为一个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初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研究深入的结果

当不再跟在清末人士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全面、系统地从不同的侧面研究科举之后,许多人发现科举并不像原先印象中的那么坏。当代科举研究中出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大多数科举研究者都较为肯定科举的作用。翻开已出版的20余本关于状元的著作,其序言或前言、后记大体以肯定科举的客观历史作用者居多。例如,有的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不少人完全否定科举考试的积极意义,认为科举考试不能造就人才。那些未曾全面深入研究过历代科举考试情形的人这样说,是信口开河;若认真研究过的人也这样说,则是片面与偏激。”[21](P4)有的学者在对清代状元的家世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科举制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的基本特征。我们对古代的科举制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22]又有学者在对以往一些批评科举的论点进行了辨析之后,指出科举制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制度,应该珍视它,发掘它,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成分,来滋养、完善并发展今天的考试制度。[23](P382-484)

只要深入全面地研究科举制,便会看出科举并不是完全属于腐朽没落的丑物,它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公平竞争的普世价值在起作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24]还有论者认为,“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不仅使选拔官员有一个文化知识所要求的衡量标准,而且把知识的深浅高低同获得权力、财富地位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知识经济”或“知识政治”。[25](P2933)总体而言,一般是对科举制研究越多越深入者,对科举制的评价越与传统定论不同。

(二) 论从史出的结果

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学者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解脱“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教条,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态度,人们便很自然得出为科举平反的结论。经过研究,许多人发现原来对科举的坏印象,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有教无类理想的产物,它确定了以才选士的原则。科举制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但它却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当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

时候,才发现它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作者得出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结论并非有意的挑战,而是如实地展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而已。[26]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有句名言:“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27](P151)一些学者认为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科举制。[28]

大多数提出为科举平反的学者原来对科举也充满了坏印象,在研究之后却改了看法,这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结果。大凡一个人研究某个问题久了以后容易产生一定的感情,或者可能稍稍夸大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但如果研究对象是宦官制度、缠足陋俗、鸦片恶习,则无论研究多久,一般人也不会去赞美它的,只会增加对阉割、缠足等泯灭人性的残酷做法的痛恨。20世纪初,人们将八股视同缠足、鸦片、纳妾一类丑恶的东西,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科举并不等同于八股,在20世纪末还将科举与缠足、宦官、盗墓等一起列入《黑二十四史》,是不相称的。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

(三) 知今通古的结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鉴古可以知今,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反观现实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对科举制进行反思,往往对科举制的印象便与以前有所不同。科举制废除以后,最早提出为科举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幡然悔悟,说“科举非恶制也”,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公然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29](P68)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称赞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刚成立,他就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30]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和讲究人情与关系的民族性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后来在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之后,一再对科举制作出赞美的评价。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是在游历东西洋国家作过比较之后才发出此论的。

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先生曾谈到,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31]而且,评价科举制要将其置于古代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从政治角度来看,科举制当然不如现代选举来得民主,但在传统社会,能够这样开放参政权已属难能可贵了。

(四) 时空距离的因素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一个事物,时间和空间距离不同,看到的景象往往差异颇大。时代不同,人们的认识也不会完全相同。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70年代以前学者的观点也不会一样。在以往批判传统、否定科举的大气候下,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偏重于采用清末学者的观点,着重批判科举的弊端,喜欢引用明清一些笔记小说的某些描写来说明科举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糟糕的一种制度,有的史料抄来抄去,层层相因,较少去阅读发掘科举时代大量肯定科举公平性和存在合理性的资料,以至于在人们印象中科举成了一种坏透顶的考试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人对科举的看法一直停留在清朝末年,科举制被判定为一种很坏的制度。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

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在临近科举制百年祭的时候,人们更加注重探讨科举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清末废科举的影响,因而往往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三、历史的反思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32](P28)历史虽然不是一位可以任人打扮的少女,但总是不断地被后人“改写”。科举制已经废止了100年,也被误解了近百年,现在是该重新评价科举制了。

一百年前,清廷发布上谕,“停止”科举考试。而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重新恢复了,这一停便是永远停止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科举就是一个坏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人们在谈到停罢科举或废止科举时,通常是使用“废除”一词。一个“除”字,便体现出除恶务尽的主观色彩,便体现出认定科举是恶制的观点。长期以来,“科举”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已被妖魔化的词语,当代一些人为了说明哪一种考试不好,往往说这种考试“变成了科举”。然而,说到底,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全面客观。“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作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科举制实行时间长,前后变化大,且其制度设计与实施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因此很难简单地说科举制是好或者不好。科举制的职能与功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异。科举制的职能是指考试选官或为国取士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目的,功能则是制度运作后的实际效果。在读书至上和官本位的传统社会,科举考试的功能十分强大,远远超出其职能范围,产生巨大的效能,致使科举考试成为指挥棒,左右了当时的政治、教育和世风。科举制的目的是选官,但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选官,它既要面向职官系统,也与社会秩序的维系、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密切相关,当其影响扩大到远不届无孔不入的程度时,利弊都被充分放大,结果使其自身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后期矛盾的集合点。

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和影响是重大而复杂的。它既有维护统一与普及文化的作用,又有压抑个性与阻碍科技的后果,既有澄清吏治与鼓励向学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很难断言其功大于罪或弊大于利,也很难准确地说是功过参半,这是一个不易用四六开或对半开来量化分析的大问题。人们往往笼统地说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发挥出较明显的积极作用,明清以后因为考八股文,弊端较为突出,选才功能下降。其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也存在着前后期的变化。八股文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其测评举子文字功底和思维能力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只是到后来水涨船高,考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考试难度不断加大,数百年教材范围都在四书五经之内,命题万变不离其宗,结果八股文这种标准化考试文体不得不走向作文的死胡同。康有为便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33](P208)物盈则亏,法久终弊。任何制度都需要与时迁徙,不断改革。唐代开成初年(836),唐文宗与宰相郑覃讨论进士科和机构改革时,曾指着面前的香炉说:“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34](P4491)确实,无论多好的制度,实行时间一久,难免出现弊端。但应该承认科举制度本身是设计得非常精密周延的。

过去批判科举制的论者常常举出清末将科举与鸦片、缠足一起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或三大恶

俗的例子,在日本至今还存在着将科举与宦官、缠足视为中国的三大“奇习”的说法。但没有人认真考证此说的由来,也很少人注意清末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科举改革与废止的影响。由于中国士人热中参加科举,科举制对中国士人的强大吸引力是当时传教士对中国精英进行传教的最大障碍,一些传教士力图影响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苦于无计可施。在清末批判科举的浪潮中,传教士推波助澜,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其中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意,有的则动机可疑。1895年,有位叫做 Fryer 的西方人曾将鸦片、缠足和科举考试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并以此作为主题在英文刊物《中国文库》上进行有奖征文。我现在还没找出“三大祸害”说的最早出处,按一般中国人的流行说法,三大祸害之一是八股文而非科举制,但传教士的征文要求却明确说是“科举考试制度”(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 [35] (P331, 479),而不是说八股文。由此看来,关于清末对科举的批判,将科举与鸦片、缠足相提并论的问题,还应该仔细加以辨析。科举制度废止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礼崩乐坏,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空间,因此对废科举一事,最高兴的可能是当时西方一些在华传教士。

庚子事变后,西方列强曾逼迫清朝政府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权利作报复措施。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辛丑各国和约》,第二款第二条明确规定:“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当时西方列强已深知科举对中国士人和地方的重要性,故在议和条约中规定闹义和团的5省46个府、州、县、城的士子不得参加乡试5年。这一惩罚条款是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初六日的上谕,上谕说:“本日奕訢、李鸿章具奏,各国周议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一折,据称顺天、太原地方乡试,仍应停止;其单开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湖南省之衡州府等地方,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著各该省督抚、学政,遵照办理,出示晓谕。钦此。”[36] (P1012) 该上谕还作为附件八附录于《辛丑各国和约》。从《癸卯北闹顺天三路分点次序单》[37]和1902年、1903年顺天、山西等乡试题名录来看,和约中限定停止考试的绝大部分府州确实没有科举生员入闱,《辛丑各国和约》的这一条款基本上是按照实施了。当初起草《辛丑和约》的西方人怎么也料想不到,4年后中国人自己却将整个科举制彻底推翻,不知他们听闻此事后会作何感想。1905年废科举时,力主速废的张之洞等人也很难想象后来人对科举制和废科举的评价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世事沧桑,时过境迁。科举制已经被废止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对科举的评价从片面走向公允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关。多年来,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往往深受现实的制约,从对科举不遗余力的批判到主张为科举制平反,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构建,皆与时事、社会背景的变迁密切相关。1905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科举制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根据科举制的全貌,也常常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受制于清末人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并源于对中国考试选才的现实利弊的观察与判断。一百年来,人们据以评论科举制的语境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废科举后的反科举语境到20-30年代的重建文官考试制度语境,从60-70年代的批判高考语境到80年代的恢复高考和重建公务员考试制度语境,再到90年代的批判“应试教育”和反思传统文化语境,大体可以看作评价科举制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科举制在评价者心目中的面貌也有所变化。21世纪初叶,中国对科举制的评价仍将处在现实考试所呈现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的影响之下。

重评科举制度、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长期的宣传和批判,许多人对科举先入为主的坏印象已根深蒂固,通常很难接受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当然,本文提出重评科举制度,并非一味为科举制唱赞歌,而是为了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而研究科举学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有助于认识考试的利弊得失和考试的发展规律,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这便是重评科举制度的目的。

然1902年山西乡试有2名举人籍贯为太原,恐为特例。见《山西乡试题名录》,《大公报》1902-10-21。

参考文献:

- [1] 杨学为. 高考文献[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2] 徐晋如. 《儒林外史》的见识高超在何处[J]. 博览群书, 2002, (9).
- [3] 张耀翔. 论科举为智力测验[N]. 晨报副刊(1493号), 1916-02-16.
- [4] 刘海峰. 科举制与“科举学”[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 [5] 王定保. 唐摭言: 卷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6] 陆九渊. 策问[A]. 陆九渊集: 卷 2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7] 王昶传[A]. 三国志: 卷 27[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8] 白居易. 论制科人状[A]. 白居易集: 卷 5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9] 刘昫. 宣宗纪[A]. 旧唐书: 卷 18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徐松. 宋会要辑稿 选举 7 之 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1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67[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2] 苏颂. 苏魏公文集: 卷 15[M]. 石印本, 1831.
- [13] 脱脱. 选举志[A]. 宋史: 卷 15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4] 徐松. 宋会要辑稿 选举 4 之 3.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15] 陈祐. 三本书[A]. 国朝文类: 卷 14[M]. 四部丛刊初编: 107 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16] 张萱. 选举 科场[A]. 西园闻见录: 卷 44[M]. 续修四库全书: 116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7] 魏源. 默觚下 治篇 9[A]. 魏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8] 吴晗. 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A]. 灯下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 [19] 董孟怀, 等. 百年教育回眸[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 [20] 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J]. 书屋, 2005, (1).
- [21] 周腊生. 宋代状元奇谈 宋代状元谱[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9.
- [22] 宋元强. 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2).
- [23] 王炳照, 徐勇.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 [24] 张亚群. 科举学的文化视角[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 (6).
- [25] 陈必龙. 状元论[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 [26] 徐晓望. 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J]. 东南学术, 1998, (6).
- [27]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8] 蒋德海. 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J]. 复旦学报, 1996, (5).
- [29] 梁启超. 官制与官规[A].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 2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0] 孙中山. 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文[N]. 临时政府公报, 第 24 号, 1912-02-28.
- [31] 杨学为. 中国需要“科举学”[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 (4).
- [32]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历史是什么[M]. 关柱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33] 康有为.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A]. 戊戌变法: 2 册[M]. 神州国光社, 1953.
- [34] 刘昫. 郑覃传[A]. 旧唐书: 卷 17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5] Notes and It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6, No. 7, July; No. 10, October, 1895.
- [36]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 册[Z].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37] 癸卯北闹顺天三路分点次序单[N]. 大公报, 第 461 号, 1903-10-02.

[责任编辑: 洪峻峰]

(英文摘要下转第 19 页)

- [9] 房宁.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J]. 战略与管理,1996,(6).
- [10] 屈超立. 科举制的廉政效应[J]. 政法论坛,2001,(5).
- [11] 刘海峰. 科举制与“科举学”[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 [12]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3] 武帝纪[A].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4] 左黄周列传[A].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5]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6] 邓嗣禹. 中国考试制度史[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
- [17] 刘海峰.“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责任编辑:洪峻峰]

Functio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riented Society

ZHENG Ruo - ling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E) system had formed its multiple functions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t also infil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is system and its position in politics turned ancient China into an IE oriented society, featured by criteria of evaluating and choosing th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ir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In federal China, the social transition from family status orientation to IE orientation indicated urgent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shake off personal interference and to pursue social equity. Influenced by it, people in China still have an examination complex today.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unctions, imperial examination oriented society

(上接第 12 页)

Reflections upon the Centennial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IU Hai - feng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history was not so dark as what it is thought of by the modern peop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appraise this system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 and non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it in the past. The prejudice today comes from th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it prevail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fact, many famous scholars in history,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aised this system, and many of them regarded this system as “the most fair” one. To redress this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an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a. A study of this system is beneficial for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stin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draw a historical lesson from it for the present examination reform.

Key word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mination, stereotyped writing